

家国情怀：刘伯坚给亲属的遗书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一

开栏的话

一件件档案、一张张照片，一处处故地、一个个个人物……见证着共产党人舍小我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

鉴往知今。从6月11日起，新华社开设《光辉历程》栏目，围绕党史上的重要档案、重大事件等，讲述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5年光辉历程，昭示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精神内核。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有一封革命烈士刘伯坚写给其亲属的遗书。潇洒的笔迹中“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言壮语，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信中谆谆嘱托自己的孩子要继续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

1935年3月4日，江西信丰县塘村山区发生了一场红白两军进行突围与包围的恶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部队，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2000余人重重包围。率队突围的红军将领刘伯坚——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享有“军中骄子”之称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

不幸负伤被捕。

在狱中，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3月16日给亲属写下了遗书，内容如下：

风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塘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对中华民族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我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知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

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寻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华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一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这一生穷苦，没有用处。

从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刘伯坚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反映了他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几天后的3月21日，刘伯坚壮烈牺牲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年仅40岁。

从以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从被捕到牺牲，刘伯坚共给亲人写了四封书信，其中三封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豹、熊三个儿子以及对他们的期望。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爱人王叔振的，信是这样写的：

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

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余

然而，刘伯坚并不知道，在他写这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

刘伯坚、王叔振的三个孩子都在难以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并先后被中央找到。1979年5月，刘伯坚、王叔振这对著名的革命夫妻，在双双壮烈牺牲44年后，他们的三个儿子在北京聚首，三个男子汉紧紧拥抱着，沉浸在悲恸、激动、自豪的复杂情绪中，这种情绪过后，重新涌聚在三兄弟心中的，是对父母无尽的缅怀。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伯坚生前留下几封遗书，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亲人革命伙伴的眷恋与不舍，更体现出一种为坚持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奋勇向前。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坚定信念：柳直荀转报郭亮的遗嘱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二

革命先烈柳直荀1928年的一封关于郭亮（原名郭靖茹）的遗嘱等问题致罗迈（即李维汉）的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中。这封不足200字的书信折射出两位烈士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虽然都是英年牺牲，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

郭亮、夏明翰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19年5月，毛泽东等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是学联的领导成员之一。

1920年秋天，郭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参加了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1年10月，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郭亮、夏明翰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随后与毛泽东一起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北伐军中的右派密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5月上旬，郭亮得柳直荀急电从汉口赶回长沙，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以备不测。

5月21日晚，许克祥等国民党反动军官率兵1000余人分途袭击工农革命团体，制造了著名的马日事变。郭亮、柳直荀等凭借少数工农武装，分别在省总工会、省农协进行了英勇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百余人遭捕杀。

危急时刻，郭亮急中生智，把从土豪劣绅处缴来的大洋抛到城外，利用敌人抢夺大洋之机率人突围出去，找到柳直荀等人商讨善后事宜和反攻计划。

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与郭亮等召集由湖南至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愿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200人开会。毛泽东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偕柳直荀等召集党员干部开会。

1927年8月，郭亮和柳直荀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到达潮汕地区时，被国民党军包围攻击，遭受极大损失。郭亮、柳直荀等被敌人围在一片海滩上，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他俩跑到一只破舢板上奋力划离海岸才得以逃脱。

1928年3月27日夜，因叛徒告密，郭亮在岳州翰林街的煤栈内被捕。

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对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9月，因肃反扩大化不幸被害，时年34岁。

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是杨开慧中学时的好友，后经杨开慧介绍与柳直荀认识并结婚。

1957年2月，李淑一把她写的纪念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词寄给毛泽东。同年5月11日，毛泽东复信李淑一，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其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表达了毛泽东对柳直荀的怀念之情。

两位年轻的革命者用生命诠释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仰。因着这份对国家民族深厚的感情，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井冈山

游客在井冈山的“井冈红旗”雕塑前参观（2009年6月30日摄）。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

革命军来到江西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

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直至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善于总结经验：撰写《湘东各县工作报告》的潘心源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三

中央档案馆里留存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潘心源1929年7月撰写的一份报告——《湘东各县工作报告》。报告对马日事变、农军攻打长沙、秋收起义、平（江）浏（阳）醴（陵）斗争等湘东各县的斗争情况作了详尽介绍。这个报告写出后仅一年多，年仅27岁的潘心源就英勇就义了，他留下的这个报告成为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

1928年冬，潘心源被增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兼任省委农民部长。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潘心源去苏联学习，后因中苏边界被封未能去成，改去上海党中央。在那里，潘心源以湖南省委委员的名义，向党中央提交了这份《湘东各县工作报告》，全文两万万余字。

1927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昌

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心源作为湖南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工农的主张。

潘心源曾参加秋收起义，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秋收起义后，潘心源继续留在浏阳搞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1928年冬，潘心源被增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兼任省委农民部长。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潘心源去苏联学习，后因中苏边界被封未能去成，改去上海党中央。在那里，潘心源以湖南省委委员的名义，向党中央提交了这份《湘东各县工作报告》，全文两万万余字。

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潘心源被委以中央巡视员重任，赴湘鄂赣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后担任红四军军委委员、政治委员，还代理过红三军政委。

1930年8月，潘心源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巡视党务和军事工作。同年12月初，在乘船去温州开会途中，因叛徒出卖，在浙江玉环县被捕后被杀害。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在工作中善于总结经验，为中国革命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95年奋斗历程中，也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积累提高中，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密切联系群众：任弼时与《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四

1943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任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今日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善于向群众学习，是任弼时对革命经历的深刻总结，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1922年，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党内出现“左”倾或右倾时，任弼时始终坚持用“向群众学

习”的态度摆正自己。

抗战初期，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时，经常强调军队建设中要注重发动群众。对于这一点，从两个美国人眼中可以得到印证。1937年12月14日，应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埃文斯·卡尔逊的要求，任弼时向客人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时说：“军队好比是鱼，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水。”

在向美国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把人民组织起来，“既是胜利的保证，又是战争结束后民主的保证”。要发动群众，首先是把日寇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讲给群众听，同时改善群众的生活。八

路军通过当地政府来减租、减税、减息，又要不让这些要求提得过高，致使有钱人破产，以有利于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抗日。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任弼时于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任弼时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事实说明，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密切联系群众分不开。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今天，我们依然倡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满腔热血捍卫不灭的信念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哪本书承载着怎样的理想与信念，值得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山东东营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回答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

1975年，文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村民刘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着当年大伙儿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也揭开这个鲁北农村学习、传承、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

20世纪早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为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中国带来新希望。《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中文全译本的缺失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心结。

1920年8月，经过数月紧张工作，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问世。但由于排版疏漏，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为“共产党宣言”。这约1000册的错版书，遂全部赠阅。有一些就随着次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奔向各地。

1926年的正月，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雨村回到家乡广饶县刘集村探亲，临别前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此时的刘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村党支部，并担任第一书记。

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至宝，经常与支部成员一同研

习。为避人耳目，用棉被掩住窗户，点起豆油灯，让妻子在屋外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虽上过几年学，刘良才初读《共产党宣言》也是磕磕绊绊、不得要领。但读得多了，想得透了，再联系起眼前长工与地主、老百姓与县老爷的尖锐矛盾，更坚定了他依靠马克思主义不懈斗争的信心。

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近百年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豪。42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易十几年来，每次结交新朋友，都会以“来自刘集”“是一名党员”来介绍自己。“前人的付出才有今天的认可，我更有底气来维护这一名誉。”刘洪燕说。

1931年，为保护在广饶身份暴露的刘良才，上级党组织委派其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将《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此时，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已被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笼罩。在囊括600余种书刊的“禁书名单”中，《共产党宣言》名列榜首，更有人因持有此书惨遭酷刑。

磨难也接踵而来。1932年，广饶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考文被捕。1933年，因叛徒出卖，刘良才在潍县被捕，随后英勇就义。这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下落，也成了个谜。

人们后来才知道，刘考文在被捕前又将首译本交予为人忠厚低调的党员刘世厚。随后的岁月里，这本书被仔细包裹着，藏在炕洞中、躲在粮囤下、掖在墙眼里，从未曾离开刘世厚的左右。

即便是1945年1月，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房屋时，首译本也得以幸免。已逃至村外的刘世厚又返回火场，避开敌人视线，忍受着烟熏火燎，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全带出。

烽火年代中的刘集村，被誉为“红色堡垒”，有据可考的烈士就有28人，解放战争中还为前线提供了200人担架队、2万斤军粮等人员物资。今天在首译本的发现地，建有专门的纪念馆，每年到此重温历史的观众有10余万人次。这段守护首译本的历史还被搬上了舞台与银幕，让更多的人知晓了这段红色历史。

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近百年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豪。42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易十几年来，每次结交新朋友，都会以“来自刘集”“是一名党员”来介绍自己。“前人的付出才有今天的认可，我更有底气来维护这一名誉。”刘洪燕说。

（据新华社济南6月19日电）

高瞻远瞩：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五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1931年的一份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件4年后，年仅36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份中共最原始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

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篇通讯和著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客观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状况。1921年5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1月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译）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年7月，瞿秋白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8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阅文件。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包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加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理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便否”。

这一《文件处理办法》成为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